

分报告十

刘怀玉教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述评

刘怀玉教授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空间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理论以及多种多样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思潮进行潜心研究,批判性地反思马克思辩证法一百多年来从一元化建构到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历史辩证法到主客体辩证法与人学辩证法,到结构辩证法,再到空间辩证法的多重转向,并对其中诸多哲学方法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释。刘怀玉教授研究主题广阔、视野宏大、成果丰硕,本文在此仅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哲学研究的专门化视角出发,以期粗浅地、概要地呈现刘怀玉教授近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哲学领域的创新性思考:他不仅仅对空间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范畴与方法论提出了很多新颖的、独到的见解,而且一直试图融会贯通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道路蕴含的空间哲学方法论问题以及中国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建构问题。这种历史哲学与社会空间逻辑互动阐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融合、经典理论与社会现实相互关照的学术品格与旨趣,可以给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任何时候都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为出发点,同时抱着全球化的视域、胸怀与使命,积极反思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说中国话,彰显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一、重思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新阐释

自列宁写了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为核心文本的“伯尔尼哲学

笔记”,辩证法便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形态究竟是什么”的世纪之争。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辩证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显学,但是自90年代以来,辩证法遭遇到了极大的理论挑战,不仅是其性质与轮廓愈益模糊不清,而且产生了诸多的争论,中国学术界对传统教科书体系不断地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很多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的判断,例如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等不同的界定。但是由于学界研究者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思维方式,没有从社会实践与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哲学贡献进行思考,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革命性实质仍旧没有被揭示出来。^①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也得益于学界对该问题的充分争论,刘怀玉教授在潜心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方法的实质是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历史辩证法,并经历了从“单义”向“多义”再向“弱义”的发展轨迹与趋势。

首先,若要理解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革命性实质,就必须破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看成是某一哲学原理和教科书体系的注解的陈旧观念,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一种体系还是一种方法。刘怀玉教授认为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硬伤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并硬化为现成存在且不容置疑的理论体系和原理。假定马克思的辩证法有唯一的严格形式和逻辑,恰恰是违背辩证法的。一方面,就其彻底的严格的批判精神和理性追求精神而言,辩证法似乎又致力于建立某个心目中绝对的严格体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超越理论、批判所有理论并且将理论现实化,致力于通过否定理论从而实现理论改变现实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是反对任何封闭的体系。所以体系论与方法论的张力和追求,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无法回避的历史遗产。辩证法本质上是反体系的,冲破理论逻辑的边界成为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方法而不是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严

^① 参见刘怀玉:《哲学前提的反思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理解视野》,《创新》,2015年第6期。

格体系的辩证法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① 刘怀玉教授的这一新见解解决了体系与方法之二元对立的研究思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与原理建设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次,传统教科书体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现象领域的应用,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整个苏联、东欧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手稿、笔记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国内也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甚至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人学唯物主义等概念去替换辩证唯物主义。刘怀玉教授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细心解读,经过多年潜心思索,创造性地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严格的绝对的唯一的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马克思笔下“严格”而“绝对”的,即“大写字母的”唯一的辩证法!黑格尔所说的历史是绝对观念抽象的不断自我外化的虚假的唯心主义观念历史,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指那种随着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实践不断自我否定的现实生活史。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进行绝对观念的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双重性批判。

最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百年发展历程一波三折,而在实践中出现的历史时机与情境是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等形态转换,那么以不断批判反思现实社会生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刘怀玉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尤其是第二国际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的持续不断地反思,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历经了“单义”“多义”之变,在当代西方则呈现为“弱义”的态势。在此过程中,辩证法经历了从主客体辩证法到人学辩证法,到结构辩证法,再到空间辩证法的多重转向,既有绝对一元论实践形态的辩证法追求,也有多元理论形态的辩证法探索与建构,由此导致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东西方世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与分化式的繁荣发展。

^① 参见刘怀玉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元性本质与多元化探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刘怀玉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态史的研究不仅深化了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哲学基础,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整体的视角。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必须具备扎实的哲学基础理论,也必须具备雄厚的哲学史知识储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二、从历史辩证法到空间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哲学的新思考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落后的沙俄得以成功建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受到普遍的质疑,尤其是在西欧革命不断遭受失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超稳定”状态的情况下,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的解释使得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脱离革命实践与现实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对理论自身进行自我批判反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同时,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现实革命运动,也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东移”。在这些境遇之下,如何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移?更进一步来说,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难题。刘怀玉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历史辩证法的艰难突围,这种突围有两个维度:一是历史性的重新构成;二是空间性的想象与重构。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特制生产方式,再到以跨国资本主义体制所主宰的世界体系为舞台的晚期资本主义后福特弹性生产方式,如此复杂的历史变迁需要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才能给予清晰的理论回应。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派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空间化阐释,甚至直接断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空间是缺席的,有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甚至直接放弃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虽然已经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历史唯物

主义为何要空间化?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缺乏空间向度?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对马克思主义有何重大意义?诸多重要的理论难题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境地。

基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空间位移与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重构,刘怀玉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始终坚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论精神,率先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哲学研究。^①刘怀玉教授也反复强调,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符合当代现实的空间化理论,才能澄清社会空间研究的科学方向,空间化研究成为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根本途径。“没有空间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抽象空洞的,没有历史方向感的空间哲学是神秘和盲目的。”^②面对当代社会现实新变化我们必须关注空间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完全无视,也不存在着空间视角的缺席,当代空间研究不能被纷繁复杂、流动多变的空间现象所迷惑,否则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甚至陷入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

第一,刘怀玉教授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空间角度之所以缺失的基本难题。例如,其一,在资本主义起源论问题上,传统研究包含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故而不能理解资本主义诞生其实是一个全球历史地理“共时性”互动的空间化过程。其二,在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方面,传统研究多因依赖于线性论和历史目的论,而把资本主义当作静止封闭的结构,无视其高度灵活自我调节的弹性空间特征。其三,传统研究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问题,缺乏实践的多重维度的社会空间辩证法意识,而拘泥于机械封闭的要素还原论思维,故无法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多重异质空间冲突交融而形成的社会现实。

刘怀玉教授经过翔实的考证、精致的分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扫清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存在的一些障碍和难题。同时,刘怀玉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绝非晚近的“发明”,而是早已有之,但是它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由隐而显的过程。

^① 参见刘怀玉:《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本体论批判》,《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 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总体的理论视野,对于空间化问题也必须放置在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当中才能得以清晰地理解,也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全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怀玉教授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的思想谱系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挖掘与整理。刘怀玉教授统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原则、资本空间积累结构论与社会形态理论,坚持从历史性与空间化的辩证路径着手,重新反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辩证法思想史。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虽然存在着空间关切,但是并没有将其当作一个总体的问题式进行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大潮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间维度才逐渐重回人们的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历史阶段的时间向度,也有横向联系的空间向度。讨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空间化需要从批判性地理解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开始。有别于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物理学空间,也有别于抽象的心理空间或文化符号结构空间,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主要考察的是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及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并非一个自明的前提,而是应当反思与还原的社会历史现象或结果。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中讨论了分工与世界市场等重要问题,但此时尚属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问题式。

刘怀玉教授认为,由于此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尚停留于第一个层面,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问题是在一种并非严格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与世界分工历史观中讨论的,空间则是隐藏于交往、分工之后隐性的、次生的、经验性的问题,因此不能过分拔高在这两部著作中关于生产空间问题的理解水平。他指出,真正体现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本质这一方法论精神的,乃是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的资本积累理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视角,向我们揭示了空间本身绝不具有自主的发展动力,它只是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结果,我们只有立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空间生产的本性。列宁、卢森堡等经典作家从资本积

累与发展不平衡理论出发,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结构、政治经济地理布展上的不平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地理学、空间发展特点,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分割殆尽,争夺完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最大限度争夺全球空间是资本主义内在生产的前提条件。列宁指出可以利用帝国主义这种瓜分,利用薄弱环节形成新的社会,这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结构,在落后国家实现革命并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承认,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这些观点,敏锐地指出了当代人类社会空间化发展的现实进程和历史逻辑。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空间不断提升与转换的过程,因而空间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基本路径之一。

第三,在详细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蕴含的空间向度与谱系的基础上,刘怀玉教授批判性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思潮试图用空间化的本体论替代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历史阶级革命论是错误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较,它们过分凸显了生产概念中的空间维度,而牺牲了历史唯物主义更根本的历史性过程论,仅仅着眼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特征而模糊了或者忽视了人类社会永恒的物质生产基础地位,可以说是一场“矫枉过正的范式转换”,要在发扬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当代空间生命力的同时,注意防范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和解构。一言以蔽之,刘怀玉教授指出,我们既要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与精神,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地在新的历史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弘扬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

第四,在反思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思潮的过程中,刘怀玉教授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通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阻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这就要求必须提出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哲学的新论题新论域。刘怀玉教授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视域中,应该关注以下核心论题: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空间化问题;②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再生产实践问题;③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问题;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概念的发生逻辑问题;⑤不平衡发展问题;⑥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野

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区域化发展问题;⑦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中国道路空间哲学问题;⑧城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问题,等等。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刘怀玉教授给我们展现了一系列生动鲜活、内容丰厚、见解独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哲学问题域。正是多年来扎实治学、严谨治学的研究精神,坚韧不拔、勇攀高峰的哲学追求,心忧国家、关怀社会的学者责任,方才使刘怀玉教授能够直达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深处。

三、列斐伏尔与《空间的生产》: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经典案例的新解读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滥觞,真正的起点应该是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市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他与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以及西班牙裔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并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理论的三剑客。他们分别以《都市革命》《社会正义与城市》《都市问题》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化空间化的问题域。其中,列斐伏尔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阐释的集大成者,尤其是他在1974年发表的《空间的生产》更是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化转向的煌煌巨作。如何理解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阐释的贡献及其存在的理论问题便成为国内学术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刘怀玉教授是国内最早最系统回答这些问题的代表性学者。刘怀玉教授自2001年开始就着手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对列斐伏尔跨越20世纪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扎实、严谨而深刻的哲学文本学解读,其成果《现代日常生活批判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①获得了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这也是国内根据第一手外语文献系统性解读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的第一部著作。

^① 刘怀玉:《现代日常生活批判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同时参见根据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或者参看201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出版的第二版修订版。

在该著作中,刘怀玉教授对马克思与列斐伏尔之间的思想渊源进行了讨论与定位,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前后期的重大理论性质转换进行了详细研究论证,他提出西方社会随着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的福特资本主义转变,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也逐渐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与存在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视角向资本主义“消费被控的官僚制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转变。通过详细的文本学研究,刘怀玉教授最终得出结论: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实践的逻辑颠倒为人本主义异化的日常生活批判与诗创实践逻辑,将马克思的宏大的历史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改造为日常生活微型权力的隐性统治的恐怖主义社会理论;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转换为福柯与尼采意义上的权力谱系学;将马克思的以政治经济制度领域为中心的宏观革命设想改造为日常生活与文化领域的微观革命乌托邦;以市场经济为着力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改造为都市化-国家-全球化“三位一体”的空间政治批判,指向一种都市革命。刘怀玉教授的研究突出了列斐伏尔后期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化转向与都市社会批判维度,并批判了其后期马克思倾向。^①

但是正如国内学者毫不讳言、精准指出的那样,后期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引进了“空间生产”理论,这一理论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这应该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进程中必须回应的基础理论问题。^②刘怀玉教授并没有止步于这一批评。在随后的十多年的哲学研究当中,他不仅主持翻译了列斐伏尔的代表作《都市革命》以及《空间的生产》,而且系统性地研究了列斐伏尔、索亚、哈维、卡斯特、詹姆逊、福柯、吉登斯等在空间理论有重大贡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① 相关的代表性论文有:《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前后转变》《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一种后马克思的都市化乌托邦构想》《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构:以列斐伏尔为个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本质批判》《〈空间的生产〉若干问题的研究》《〈空间的生产〉的空间历史唯物主义观》以及会议论文《日常生活批判:20世纪哲学基础问题的兴起与衰落》《从Praxis到Poiesis: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生存本体论理解》,等等。这些论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列斐伏尔思想变迁,并且对我们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② 参见仰海峰:《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地理学家、都市社会学家,系统性地回答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空间问题域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重点回答了列斐伏尔晚年空间生产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问题。

第一,重新定位列斐伏尔晚期思想的哲学性质,澄清长期以来被西方研究者误读、曲解的列斐伏尔。长期以来,列斐伏尔在苏联、东欧以及我国学界仅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得到研究批判,其后期的城市空间哲学,甚至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而英语世界则大呼列斐伏尔实现了空间转向。刘怀玉教授认为列斐伏尔本人的哲学思想并不存在一个根本颠倒性的空间转向,空间批判理论是列斐伏尔持续一生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思想的具体化与空间化呈现。列斐伏尔提出空间问题,并不是新的研究计划,而是其都市社会学研究的总结与最高成果;空间化研究不是改弦易辙、另谋新路,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①“空间”“日常生活”“都市”等都是些近似的问题,其母体都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理论。不仅如此,列斐伏尔始终不停地追问的根本问题没有发生变化,即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幸存?其主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总是能够找到转嫁危机的殖民地,这块殖民地既是外部不发达地区,也是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

由此,刘怀玉教授批评反驳了以哈维、卡斯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地理学”解读模式,也批评了以索亚、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主义”解读模式。前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主义的结构论遮蔽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中的存在主义后人本学的辩证法思想,这就使列斐伏尔哲学思想中的张力被大打折扣了。后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列斐伏尔还原为一位解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阶级革命论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鼻祖”,从而将列斐伏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信念完全抹杀,演变为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民主主义的“话语反抗者”,最终将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实践特质打扮成了“去政治化”的漫无目的的“差异主义”“多元主义”的语言游牧者。

第二,刘怀玉教授反驳批评了西方对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思想的误解,

^① 参见刘怀玉:《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访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西方在空间转向的地理学视野中普遍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核心就是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不分主次的结构性“三元空间辩证法”。这其实并没有真正领悟列斐伏尔辩证法思想的精神实质。相反,刘怀玉教授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生命力是从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空间矛盾与危机中寻找新的可能的社会生活创造与变革的道路与实践。空间生产理论之核心思想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之空间表现的空间矛盾辩证法,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说到底社会矛盾辩证法的空间体现,归根结底三元空间辩证法是一种空间矛盾或者空间性矛盾的辩证法,是社会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段的时间性矛盾的共时性/集中化表现。也就是说,空间辩证法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性/历时性的辩证法的共时性和集中化表现。在这种矛盾辩证法中,孕育着列斐伏尔一生的革命夙愿:那就是打破资本主义抽象的日常抽象的霸权空间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的差异性空间。这种实现的具体路径就是城市权利与差异空间政治实践。

第三,刘怀玉教授系统阐明了《空间的生产》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重大理论贡献。《空间的生产》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一方面把空间动态化地理解为历史发生的前提与结果,另一方面把历史具体化地理解为具有持存性、共存性形态的社会空间关系存在;把空间化问题从一个基本哲学范畴与社会理论问题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核心课题。空间并非物质世界本身既定存在方式而是社会历史产物。要理解此命题,须对以往生产概念与空间概念作重新理解,打破僵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法,把空间理解为一个探索的创造的过程,将其从静止的再现性的社会结构概念转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产物的辩证运动过程。对空间的生产性、历史性理解以及对社会历史的空间性理解的辩证统一,成为列斐伏尔提供给我们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其一,列斐伏尔认为从空间中的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全球化及区域化发展的必然理论创新要求。其二,列斐伏尔逆溯式地考察了自然空间、绝对空间、历史空间、抽象空间以及矛盾空间的历史转型,从历史比较角度阐明了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意义。

其三,列斐伏尔并不是以空间生产反对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原则,相反,列斐伏尔认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第一性原则,批判在空间科学内部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列斐伏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真精神与目标就是建立以空间的生产为核心逻辑的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批判。这是列斐伏尔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做出的最重大的理论贡献。

第四,刘怀玉教授清醒地认识到研究西方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最终目的还是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打下扎实的根基,在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态度上,我们既要认真研究,吸收其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精华,同时也不能掉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或者错误歧途当中亦步亦趋不能自拔。我们必须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批判性地理解、评价吸收那些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方面,明确反对那些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这部著作而言,刘怀玉教授并没有人云亦云地无限夸大其贡献和意义,而是在肯定其思想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其存在的严重的认识论偏差。一方面,列斐伏尔大胆突破教条的束缚,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空间根基入手重构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空间维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创新;另一方面,指出了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拓展存在“过度诠释”的弊病,空间的生产解释模式实质上构成了对经典的物质生产第一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核心逻辑的取代与否定。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走向了一种变相反对生产主义与发展主义的浪漫主义式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误区。列斐伏尔的差异空间的辩证法不仅取消了黑格尔、马克思以关于矛盾的辩证扬弃为指向的历史辩证法的根基性,而且因此取消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辩证法叙事,势必迷失历史方向,只剩下微观的身体空间政治批判激进话语。这就是说,空间生产理论最深刻的教训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解释是不能以否定历史辩证法为前提与代价的。^①

^① 参见刘怀玉:《〈空间的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四、“重回世界的东方”：中国道路的空间哲学研究的新开拓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不仅更新了我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题与深度,而且亦为我们反思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与理论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仅仅扭转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过分重视“历史”的叙事而对空间维度的忽视,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边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辩证法,强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释力生命力,而且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性提供了空间哲学的新视角。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道路在历史转型中逐渐形成、凝结、凸显的历史,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①

刘怀玉教授近年来持之以恒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进行深度耕犁,并且批判性地汲取这些学术资源,将空间哲学的范畴体系、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地中国化转化,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思维去反思、概括和回答我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所蕴含的重大哲学思想。换言之,刘怀玉教授将对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的探索与对中国近现代曲折发展的社会历史转型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方法论应用于中国道路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反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道路的空间哲学问题。这种具有主体自觉性、理论原创性的问题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它不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盲目追随,而是以高度的主体自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对话、交流;它不是先验的空间哲学话语的中国化套用,而是得益于多年来对中国道路深层民族特色与哲学逻辑的匠心体悟,是建立在对马克思

^① 参见刘怀玉、刘必好:《“中国道路”自信问题的若干空间哲学思考》,《探索》,2017 年第 6 期;《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哲学表达》,《光明日报》,2018 年 8 月 20 日。

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革命建设实践的社会史进行双向互动基础上创造性哲学反思的结果。

由于受到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强烈影响,我国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被禁锢在进化论的、线性时间的、机械的“客观规律”的教条主义窠臼之中,在这种教条主义历史观的加持之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转型的解释,既局限在亡国与图存、压迫与反抗、奴役与革命的单纯线性进化论的时间视野当中,忽视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实践蕴含的复杂的空间辩证法,又陷入了一种排他的、封闭的、地域性的民族主义叙事怪圈之中,从而无视全球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潮流中的位置和贡献,这便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性历史意义。易言之,现代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处于历时性的过程之中,而且处于共时性的不平衡的等级序列中,没有这种自觉的历史与空间理论视野的融会贯通,便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者狭隘的地域民族主义的偏颇与极端,如此是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中国道路彰显出来的伟大哲学意义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进程的空间哲学反思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刘怀玉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空间辩证法视角去揭示中国道路自信中蕴含的历史规律的理论探索,不仅有助于更为完善地建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而且有利于深化研究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总体而言,刘怀玉教授从全球变化与我国发展互动空间出发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历程予以反思,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哲学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为理解中国道路所开拓的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提供创新性的哲学方法论。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也是“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那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逐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则彻底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如何把握中国道路的独特历史经验?如何将这种经验与

世界性和时代性的问题联系起来?如何将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总结、概括、提升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有的学者基本是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尺度或者框架,而不是依循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逻辑,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与理论观念的产生;也有学者是从儒家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角度来分析与反省这段历史;还有学者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社会主义实践史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观念历史。”^①

刘怀玉教授认为解答以上理论问题不是哪一种单一的现成观念能够完成的,要理解中国道路实践所体现的深刻内涵,必须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把争取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空间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二是历史循环论,认为当前的发展新空间理论只是过去历史某一时期理论政策的重复或者改头换面。哲学是思想着的时代,时代是流动着的思想。刘怀玉教授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几十年的哲学反思,以坚毅深刻的理论抽象思维能力,洞察、捕捉、提炼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道路自信中存在着的空间辩证法。从狭义的历史辩证法来讲,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既是空间重构创新过程,也是“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②突破西方自由主义空间控制的过程。从发展空间的主体能动性来看,中国现代化经历了被资本的力量卷入全球化向努力驾驭资本并逐步找到中国道路应有空间的曲折过程。

中国正在实现的由生存问题向发展问题、由被动式发展向主动式发展、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多重转变,也是一个全球化和中国化两个空间相互重构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内含着深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1)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独立发展空间的艰辛历程。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析传统中国王朝空间崩溃的原因以及沦为西方世界体系附属的必然性,重点阐明为获得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空间,中

^① 刘怀玉:《中国现代化观念世纪之争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对邓小平理论形成背景的一种理解》,《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刘怀玉:《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科学历史观分析》,《哲学研究》,1995年第7期;《乌托邦、末世论与西方历史进步哲学观念批判》,《史学学刊》,1999年第5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农村-城市”生存发展空间转换的双重否定逻辑,从中揭示近代中国如何从第一次自信危机到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自信的内在历史规律。

(2)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历史空间辩证法。以国际国内交织互动视野,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发展空间的探索过程,重点研究区域均衡发展空间战略和“三个世界”的国际发展空间辩证法理论,由此反思中国道路的初步自信经验及其内外问题。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空间模式的突破。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空间模式经验教训基础上,研究“两个大局”的空间辩证法和全方位国际发展空间战略,从中把握当代中国如何克服第二次自信危机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因而确立新的道路自信之辩证发展规律。

(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空间辩证法的前沿问题。在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基础上,重点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化、区域化、国际化发展过程与趋势中的新思想成果,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中包含的新文明空间辩证法思想问题,由此理解新时代中国如何主动引领世界构建“一带一路”与新共同体,进而实现真正道路自信之内在发生逻辑。^①

通过对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的空间互动历程的审视,刘怀玉教授坚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经验总结,而且也为世界其他后发国家独立快速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言以蔽之,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指引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同时也不断催生和引导着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创新。

^① 参见刘怀玉:《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刘怀玉、刘必好:《中国新发展空间辩证法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建构》,《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3期;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空间话语与中国实践》,《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刘怀玉:《社会主义如何让人栖居于现代都市?——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一书再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